

## 《原君原臣》小引作者考

孙卫华

(中南民族大学 哲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孙中山持赠日本友人南方熊楠《原君原臣》的小册子,是兴中会用来宣传革命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宣传品之一,其小引作者署名“杞忧公子”。“杞忧公子”到底是谁,学界或认为是王韬、或认为是郑观应、或认为是孙中山。认为是孙中山的,虽有详实考证,但其论证存在诸多不自洽的地方,难以令人信服。认为是王韬或是郑观应的,没有严格的考证,并缺乏可靠证据,也不足为信。其作者到底为谁?这不仅将关系到该作者在近代思想启蒙方面充当了何种角色,也将涉及到《明夷待访录》在晚清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本文从郑观应的思想倾向,其著作与《明夷待访录》的比较、其本人与孙中山的关系等方面详加考察,认为小引作者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王韬,而应为郑观应。

**关键词:**孙中山;郑观应;《原君原臣》;《盛世危言》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99(2014)06-0023-08

##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Writer for the Foreword in the Pamphlet *The Traditional Monarch and Courtier*

SUN Wei-hua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pamphlet, *The Traditional Monarch and Courtier*, which Dr. Sun Yat-sen donated to his Japanese friend, South Kumagus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propaganda of revolutionary ideas by China Revival Society. The signature of the writer for the foreword was “Qi You Gong Zi”. Then, who was the writer named “Qi You Gong Zi”? In the academic world, some scholars considered that it was Wang Tao; but others thought that it was Zheng Guanying;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others who believed that it was Dr. Sun Yat-sen. Although those who considered it was Dr. Sun Yat-sen could provide detailed process of research, their argumentation was not logical all the time. Therefore, it was hard to convince the people.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it was Wang Tao or Zheng Guanying was lack of specific research process, and the evidences that they could provide were not sufficient and reliable, so they were also unconvincing. Then who was the real writer for it? This was related not only with what a role he was playing in th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thought, but also with the question of what function the book, *Waiting for the Dawn*, had played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views that Zheng Guanying demonstrated at that time, the comparison of the works by Zheng with the book, *Waiting for the Dawn*, and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

收稿日期:2014-0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与儒学近代转型”(10CZX026);中国博士后第四批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104195);中南民族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晚明三大家’与儒学近代转型”(CSY12037)。

作者简介:孙卫华(1972-),男,河南信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哲学。

tween Zheng Guanying and Dr. Sun Yat - sen and the like , the present writer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the writer is neither Sun Yat - sen , nor Wang Tao , but Zheng Guanying.

**Key words:** Dr. Sun Yat - sen; Zheng Guanying; *The Traditional Monarch and Courtier*; *Warns at the Time of Prosperity*

1897年6月28日,孙中山将《原君原臣》和《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赠送给日本友人南方熊楠<sup>[1]</sup>。《原君原臣》为黄宗羲的政治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两篇的节钞本,是1895年冬经日本横滨文经商店(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开设)翻印,正文前有署名“杞忧公子”撰写的小引。此书的小引作者是谁,学界有三种说法:杨际开认为是王韬<sup>[2]</sup>;小野和子<sup>[3]</sup>和李敖<sup>[4][5]</sup>均认为是郑观应;方祖猷认为是孙中山本人<sup>[5]</sup>。前两种观点都是只是推测,并未详细论证,尚需进一步探讨;第三种观点虽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但其考证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谁是小引的作者,这将涉及到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即此作者在近代思想启蒙方面充当何种角色?《明夷待访录》在传播过程中,尤其是在晚清的传播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职是之故,笔者不揣冒昧,对之详加考证,并作一定的推理,以期就教于方祖猷先生及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们。

### 一、方祖猷先生考证之不自洽性

《原君原臣》小引的作者到底是谁?为方便论证,先将小引全文抄录如下:

从来天生民而立之君长,所以为民役者也,君一人不能独治万几,于是建设臣工以分治之,凡佐君为民役者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千古之通义,先觉言之,后世讳之,皆未知君臣之义,悉为治民而生。苟大地子子无生民,又何从有君?又何从有臣工哉?惟不知立君之为民,故一人晏安,百姓失所;惟不知立臣之亦为民,故百僚阿顺,损上益上。呜呼!此其弊,人人心非之而人人不能深知之、明言之,陵夷以至于今天,心之所深恫也。唯有明黄梨洲先生,家传忠孝,卓犖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尝著《明夷待访录》一编,附托于箕子之蒙难艰贞。内有《原君》、《原臣》二论,尤足握全书之要,垂万世之谟。爰摘录印行,希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而张中国自强之本。孔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窃遵斯

旨,以告夫当世之有心富强者。乙未立夏,杞忧公子小引。<sup>[1]540</sup>

方祖猷先生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启蒙》一文(以下简称“方文”)中通过论证,认为小引作者就是孙中山本人。方文首先从时间上考察了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活动,排除了他们二人撰写该小引的可能性。接着,方文例举了四条理由,分别证明“这本小册子是革命派所印,而杞忧公子即孙中山”。第一条论证“小册子是革命派所印”,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第二、三、四条论证“杞忧公子即孙中山”,逻辑不够严谨,证据尚欠充分,结论难以服人。

方文的第二条谓“兴中会成立初期,极其缺乏写作人才。当时与孙中山志趣相投、关系密切的友人,多受过西方的教育,然而深谙国语者基本无人。……只有陈少白善于词章,然政论非其所长。……环顾当时这些少数革命志士,只有孙中山有可能引用孟子原文来作序。”该条在论证方面犯了选言推理不周延的错误。推理范围不能仅局限于兴中会成员,非兴中会也应包括在内。若他们都无能力撰写该小引,才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孙中山具备撰写此小引的能力。若不是这样,此推理就是一个或然的推理,而非必然的推理。

方文的第三条谓“若这篇《原君原臣序》非孙中山著,他是不可能将他人所写序言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节录本签上自己名字赠人的。”这条明显与常识不符。即使古人的著作,也多由作者的好友,或门人弟子们为之作序;现代学人的著作序言也多由他人撰写,并以之赠人斧正。若按照方文的逻辑,只有本人作序的著作方可签自己的名字赠人的话,恐怕没有多少赠人的著作符合这条标准吧!方文所说的“是不可能”的判断过于武断,与事实恰恰相反。

方文的第四条谓“更重要的是,他在伦敦蒙难时,清金山总领事冯咏衡向清廷禀报:查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一系上李傅相书,自称‘文’。……清廷使馆人员又多次对他审讯,断定他‘自称杞忧公子’,即孙中山承认他自己就是为《原君原臣》作序的杞忧公子。”第一个“自

称”本应指小引作者自称,若此作者就是孙中山的话,当然可以按照方文的逻辑,就是孙中山自称。但问题是,此作者是否就是孙中山,还值得考证;第二个“自称”应为上李傅相书的作者自称,因此书原本就是孙中山本人所撰,所以这个自称也就是他自己称自己。方祖猷在引文方面有断章取义之嫌,故而理解出现了偏差。上段较完整的引文应为:“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册两本,虽无悖逆实迹,检其上传相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原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问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查阅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一系上李傅相书,洋洋万余言,自称‘文素在香港习西医,已蒙考取,敬乞傅相专委办农务。’两种文笔俱畅达,昨已附致总署备核矣。”<sup>[4]</sup><sup>43</sup>此文明确指出,上李傅相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而对于“杞忧公子”为谁,并未确指。方文的这条理由最不合情理,即使孙中山就是如此供认的,也不能完全将之当做实话。难道孙中山要供认“杞忧公子”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好友某某所为吗?那样的话,孙中山岂不变成了出卖朋友的无耻之徒了吗?

方文为了证明小引为孙中山所为,通过例举孙中山后期大量的言论,比较二者的相似性,看上去似乎非常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若按照方先生的看法,孙中山的思想在1895年岂不是已经相当成熟了?方文的考证若能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孙中山后来的言论仅是对此小引思想的重复或换种表述方式而已,果真如此,是抬高孙中山呢还是贬抑孙中山呢?根据阿尔伯特·克里格提出的“代际逻辑”的说法,柯文指出“在任何给定的一代中所能发生的变化都是有限度的,而这种限度是任何人物——无论多么卓越——都无法超越的。这是历史变迁进程的否定方面。就正面来说,每一代人都为世界贡献了某些新东西,并就此为下一代人改变这种限制提供可能性。根据这种‘代际逻辑’,孙中山在本世纪初之所想所做。部分是建筑在他的前辈当年所想所做的基础之上。孙中山并非在不成熟的氛围中创造革命(事件)。实际上,在他出生之时(1866),中国已经孕育了革命(进程)。”<sup>[6]</sup><sup>18</sup>按照柯文所指的“代际逻辑”的观点来理解,年青的孙中山革命思想远未如此成熟,自然难以写出小引那些深刻的话来。

另外,小引并未完全反对君主,而孙中山在1894年,即该小引写作的前一年创立了兴中会,《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明确地提出其宗旨是“驱

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sup>[7]</sup><sup>20</sup>。显然,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合众新政府。要实现此目标,君主自然是要被彻底推翻的。对此矛盾,方先生已意识到了,不过他给了一个非常勉强的解释:

在他上书李鸿章被拒后,即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这一年春,他在香港设兴中会总机关,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筹划广州起义。可是是年立夏,孙中山写《原君原臣序》,在这篇《序》里尚保留了“君”的位置,他引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对君主制批判的口气尚比较缓和。而黄宗羲在《原君》篇里直斥专制君主为“寇仇”,为“独夫”,其遣词用语之激烈,甚于孙中山,说明当时孙中山虽接受了黄宗羲的观点,然当时考虑的重点在“驱逐鞑虏”的种族主义,而较少“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权主义。

这显然是一个不能自洽的解释!孙中山既然立志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又何需使用缓和的口气呢?若仍要保留“君”位,只能说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不够彻底,具有两面性。如此理解,恐怕不仅不会被人认同,孙中山本人也不能接受。

方先生在推断小引的作者时,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即不是谭嗣同、梁启超所为,就是孙中山所为。这种推论显然忽视了第三者,我们还可以推断,不是谭嗣同、梁启超所为,也不是孙中山所为,而是其他某某所为。方先生主观上有故意拔高孙中山早期思想之嫌,或者说有先入为主之嫌,实际上却贬抑了孙中山。人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将孙中山后期完全成熟的思想来论证其早期尚未完全成熟的思想,历史与逻辑难以统一。

## 二、郑观应的著作与《明夷待访录》之比较

与方祖猷先生的看法不同,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和台湾学者李敖均认定小引作者是郑观应。李敖直接在注释中注明“郑观应”,但不知其据何而得此论。小野和子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八卷本中收录了《原君》一篇,断定有他明显读过黄宗羲的《原君》的痕迹;其二,小引中引用孟子“民为贵”一类的话,在文中也可以看出若干类似之处;其三,还有一篇名为“甲午后续”的附言,可知这是在日清战争以后加写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此前后时间,即使郑观应的桌边放有黄

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sup>[3]</sup>小野和子的推测虽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简略。笔者在她的理由基础上,将郑观应的著作与《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小引进行比较,同时考察小引作者“杞忧公子”与郑观应的号“杞忧生”之间、郑观应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证明小引的作者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王韬,而应为郑观应。

小野和子给出的第一点理由,确实有道理。我们先比较一下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一,不仅二者都有《原君》篇,还有《学校》《建都》《阍宦》等相同的篇名;其二,即使篇名不同,二者讨论的议题却十分接近,比如郑观应的《考试》上下两篇与黄宗羲的《取士》上下两篇、《边防》与《方镇》等。二者篇名完全相同也好,讨论的议题十分接近也罢,实际上并不能说明什么,这些题目在晚期很多注重中都容易找到。比如《皇朝经世文编》中就有《吏胥》、《学校》、《兵制》等这样的篇名。郑观应是否受《明夷待访录》影响,关键的是要看他有没有与《明夷待访录》相同或相近的观点或表述。经认真研读,我们发现以下一些段落及句子,确实与《明夷待访录》的表述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盛世危言》的《原君》篇说“使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sup>[8]333</sup>“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与《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中的“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产业”<sup>[9]8</sup>“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意思相近。“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与《明夷待访录》的《原臣》篇中的“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以及《置相》篇的“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等意思极其接近。“分治之以群工”的观点,在《盛世危言》的《典礼上》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夫人主一身,岂能综理庶务,势不得不委任臣下,而大臣又不得事事躬亲,亦不得不分任其责于属僚。”<sup>[8]379</sup>

《盛世危言》的《原君》篇还说“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sup>[8]332</sup>“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与《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的“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

之大公”相接近。“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与《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中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摄缄滕,固扃鐍,……”以及《原法》篇中的“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等意思差不多。

在十四卷本《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郑观应增加了这么一段文字:

先王之意,必使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而后所设学校非虚,其法始备,此学所以为养士之要,而上古人才所以出于学校者独盛也。自后簿书、典例、钱谷、讼狱,一切委之俗吏,而六艺之学亦渐废而不讲。遂以学校为无当缓急,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器争,熏心富贵。上以势利诱之,下亦以势利应之。学校废而书院兴,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当世之务,而为国家之用。<sup>[8]245</sup>

此段文字分明是对黄宗羲《学校》篇开头几段文字的改写。黄宗羲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器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sup>[9]28-29</sup>

比较此两段文字,我们会发现,郑观应象黄宗羲一样,一开始就指出学校的功能不仅在于养士,而且还时“治天下之学”的源头。两段文字,从论述语序上几乎无二致,完全相同的表述有“簿书、典例、钱谷、讼狱,一切委之俗吏”、“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器争,熏心富贵。”略有差别的有,“必使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而后所设学校非虚,其法始备”与“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校废而书院兴”与“学校变而为书院”等。如此表述的类似,绝非偶然。郑观应若没有读过《明夷待访录》,是难以想象的。若用现代学术标准来看,郑观应此段话难逃剽窃嫌疑。

郑观应《易言》中也有与《明夷待访录》相近的痕迹。《论议政》篇说“窃考三代之制: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搢绅相议于学校。”<sup>[8]103</sup>“议政于学校”是黄宗羲在《学校》篇中提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郑观应亦认为“士民搢

绅”们议政于学校,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处。《论考试》篇说“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取士之途,乡举里选,惟重实学至行。宽其途以求士,故野无遗贤;严其制以用人,故朝无幸进。降而唐、宋,严于取而宽于用。始当考试,斤斤然拘于一格。至今因之,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沈沦;其用士也宽,则庸佞不无忝窃。”<sup>[8]104</sup> 此段若对照《明夷待访录》的“取士下”篇,就会发现二者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至于小野和子所举的第二条证据不足以成为证据,因为黄宗羲的思想很多来自孟子。孟子的很多言论不断被后人引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郑观应引用之也不足为奇。倡导民权者首先就要承认“民为贵”价值优先性。郑观应虽然倡导君主政治,但他理想中的君主政治是类似于英国式的虚君政治<sup>①</sup>,此政治对民权是充分尊重的,所以郑观应多处表达了对孟子思想的崇敬。郑观应曾写有“况复亚圣垂名言,民为贵兮次社稷”<sup>[10]1351</sup>一句诗,在《答汪甘卿孝廉》中,郑观应表达了与上一句诗相近的看法“人说泰西法,我说出孔孟。视臣如手足,社稷重百姓。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泰西能力行,东瀛称善政,明治始维新,借此以自镜。”<sup>[10]1355</sup>

在将郑观应的著作与《明夷待访录》相比较后,若认为郑观应没有看过该书,恐怕难以令人置信。甲午前后,看过《明夷待访录》的王韬,拥有黄承乙刊本的宋恕都生活在上海。<sup>②</sup>作为王韬的好友,爱读书的郑观应若是看不到《明夷待访录》,就非常奇怪了。诚如小野和子所说,“在此前后时间,即使郑观应的桌边放有《明夷待访录》,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郑观应对《明夷待访录》讳莫如深,就如同康有为对其是否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置之不理一般,也定有其原因。

### 三、郑观应的著作与《原君原臣》小引之比较

郑观应并未完全排除君主的位置,他的政治理想是立君政治。郑观应说“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未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郑

观应之所以认为专制政治不如立君政治,除立君政治比专制政治更具有大公精神外,还在于专制政治利弊两分。他说“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而天下治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骸法,而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兴,秦二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在郑观应看来,专制政治的利在开创之初,比如汉高祖之所以兴;其弊在守成之时,比如秦二世之所以亡。而当时清朝并非处于开创之初,而是处于守成之时,如此比较,利弊自然分晓了。郑观应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君主政治,而是立君政治。他认为“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sup>[8]338</sup>他通过外国的经验,来证明其看法的正确性。他说“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sup>[8]338</sup>英、德、日本等国,在当时都是世界强国,他们致富的缘由都是采用立君政治的统治方式。

郑观应立君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与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有很大的区别。这与《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并不矛盾。黄宗羲最多只说“向使无君,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显然,黄宗羲也并不主张去君,仅倡导虚君而已。《原君原臣》的小引虽然仅有三百多字,但其行文习惯却非常有特色。它与郑观应著作中的多处表述十分接近。我们从文中至少可以找出三处。

郑观应在《致姚伯怀太守书》中说“夫中国之君权至重且专,然一日万几,天子不能独治,势必责于部、院;而部、院咨于疆吏、札于州、县;州、县询于胥吏。”<sup>[10]297</sup>与小引的“从来天生民而立之君长,所以为民役者也,君一人不能独治万几,于是建设臣工以分治之”一句的意思相同。此为一相近也。

小引中的“凡佐君为民役者也”一句中的“民役”一词与《盛世危言》“原君”篇的中“知君人者,欲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用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sup>[8]334</sup>一句中的“人役”一词同。“民役”中“民”是指与君臣相区别的庶民,即被统治者;而“人役”中的“人”是相对于人主而言,指除君以外

<sup>①</sup>“英、德二国驯致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遵斯道耳。”参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盛世危言·自强论》,第338页。

<sup>②</sup>1897年夏季,宋恕给童学琦、胡道南二人的信中称“《待访录》敝处止有族孙承乙校梓本(近刻者),如尊处无其书,示知寄用。”参见宋恕《又复胡、童书》(胡珠生《宋恕集》卷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5页)。

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臣在内。可见,“民役”与“人役”只是针对的对象不同而已,并无多大差别。此为二相近也。

郑观应向好友文廷式和陈炽表露了其著述《盛世危言》的动机,他说“鄙人所著《盛世危言》一书大声疾呼,使政界中人猛省知爱国保民之道也。”<sup>[10]370</sup>他向他还想借助西人李提摩太的影响,助其推广《盛世危言》的变法思想。为此,郑观应写信特邀李提摩太帮助他们说服朝廷“弟与经君莲珊痛愚民之政未改,愿出往来北京舟车等费,欲求大驾赴京一行,将民何疾苦痛陈,应如何改良方合,条陈我政府,请英公使转呈。或蒙我政府准如所请,能照《盛世危言》所论采择施行,则我国廿一行省百姓无不感激,岂但为朝廷祈天永命而已哉。”<sup>[10]1166</sup>不仅如此,在《知耻图说跋》中,郑观应开篇即批驳了时人对《盛世危言》等书传播虽广泛传播,为何风尚未大开的责难。此责难或是事实,或是郑观应故意使用的主客问答方法,以此表露《盛世危言》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他说“或问曰:《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劝学篇》诸书,均邀乙览,且《盛世危言》皆阐明中外政治得失。闻各省书坊辗转翻刻,已售至十余万部之多。早识先几,朝野称赏,何风气尚未大开乎?”<sup>[10]336-337</sup>在《〈盛世危言〉付梓书感》一诗中,郑观应吟道“内患外忧萦绉绉,天时人事感茫茫。中书粉饰今应变,请诵绸缪未雨章。”<sup>[10]1288</sup>从以上所引,可见郑观应当时求变法、致富强的心情与小引作者“窃遵斯旨,以告夫当世之有心富强者”一句所显露的心情十分接近。此为三相近也。

由此可见,小引的作者遵循黄宗羲《原君》篇的本旨,并未否定君主制。只是针对君主制中的专制政治、君民共主政治发表的看法,此与孙中山倡导推翻君主专制的观点不尽相同。

#### 四、郑观应与“杞忧公子”名称之关系

在与孙中山交往的人当中,郑观应不仅有很高理论修养和文字功力,而且富有时望<sup>①</sup>,同时他还曾使用过“杞忧生”的号。“生”或“公子”都只是

一种称谓而已,如同“子”一般。黄遵宪在给王韬的信中称“读贵报,有杞忧子《易言书后》二篇。是公著述,偶曾一读,心仪其人,访其姓名,仅知为岭南人,姓郑。”<sup>[11]</sup>光绪元年花朝日,王韬给郑观应的《易言》作序,时而称“杞忧生”,时而称“杞忧子”<sup>[8]161</sup>。光绪六年王韬所作的跋亦是如此<sup>[8]168</sup>。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在多处都表达了他心忧天下的心情。在自序中,他说“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sup>[8]236</sup>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郑观应又说“当此危疑震撼之时,杞忧忠愤两不能禁,是以卅余年来,不惮心力交瘁,不顾忌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耳。”<sup>[8]237</sup>由此可见,郑观应使用“杞忧生”这样的名称与他忧国忧民的心情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小引的“杞忧公子”与“杞忧生”之间,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郑观应的“杞忧生”的号是在1880年前后撰写《易言》时使用的,王韬为《易言》之书撰写的跋<sup>[12]</sup>以及在光绪元年为其撰写的序<sup>[8]61-62</sup>,都称郑观应为“杞忧生”。之后郑观应又将“杞忧生”改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sup>[8]235</sup>。乙未年(1895)立夏,《原君原臣》小引的作者“杞忧公子”与“杞忧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郑观应对清朝文字狱不仅有忌惮,而且无论是从商还是从官,他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谨慎。1880年,郑观应刊行《易言》,王韬为其开脱,为此,郑观应意识到犯时忌了。于是以“丑不自溺,僭且招尤”为辞,请谢家福等友人迅速将《易言》中《论议政》等要变“体”与“道”的那些篇删掉,成为二十篇本,仅仅几个月即印好,分赠诸友,以事澄清<sup>[13]</sup>。“慎”与“清”、“勤”一起,为郑观应一生秉持的做人准则。无论是训子或兄弟<sup>②</sup>,还是告诫侄辈<sup>③</sup>,他

①1894年,郑观应应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之聘,为格致书院学员命题七道。据夏东元说,当时给格致书院命题的都是社会名流和官场具有改革思想的督抚道台们,有李鸿章,曾国荃、盛宣怀等17人。郑观应是其中命题最多者之一,也是官衔最小者,其声望之隆于此可见。参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页。

②在《训长男润林并录寄月岩弟》中,郑观应说“吾在家尝教人固穷勤俭,劳苦忍辱,谨慎谦恭,长于一艺为谋生之本。在外亦当如是,勿贪意外之财为人所陷害也。”在另一封《训长男润林书》中,郑观应说“余有生以来,素位而行,惟守清、慎、勤三字。”在《训次儿润潮书》中,郑观应说“清、慎、勤三字,古之循吏垂为官箴,余谓此三字不特为官宜守之,即作商亦宜奉作金科玉律。”分别参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118、1201和1208页。

③在《与纪常侄书》中,郑观应叮咛“大凡为政临民不难得上峰眷注,而难在下民爱戴。无许官亲在外招摇,所有书吏幕友均须留意体察,免为若辈所蒙。清、慎、勤三字时刻勿忘,交涉之事如万不能从者即执条约公法以理拒之,不可迁就以遗后患。”参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396页。

都将告诫他们一定要谨慎。在一首《训子》诗中,郑观应以诸葛亮为鉴,表达他谨慎的行为原则。他说“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嘉言懿行宜多识,学贯天人乃大儒。”<sup>[10]1364</sup>

1886年以前,郑观应曾因生意上的问题,遭受重创,不仅丧失了大笔财富,还失去了李鸿章的信任。这对于郑观应来说,无疑是一次惨重的教训。自此以后,他变得越发谨慎了,深怕惹祸。后来,他在多处都表露了这种心迹。比如他说“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憨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sup>[8]236</sup>“是书遇事直言,动触忌讳,虽为忠愤所激,究属僭越狂憨,难免获罪当道,是以犹豫未即付刊。不期孙尚书、邓方伯虚怀若谷,虽小善亦必率录,遂蒙进呈御览。”<sup>[8]239</sup>这些话绝非官面上的话,而是内心真实的写照。

正是这种谨慎,使郑观应对于触动时忌的内容都非常小心。《明夷待访录》作为晚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最为犀利的著作,整个清朝在严酷的文字狱氛围中,郑观应自然也对其采取了隐而勿谈的态度。即使他看过《明夷待访录》,并受到《明夷待访录》很深的影响,但出于避免文字忌讳的考虑,对其绝口不提。前文已经比较了郑观应的著作与《明夷待访录》思想的诸多相同、相近之处,但不能因此认为郑观应剽窃,之所以隐而不发,显然是为了避祸。这也许是为何在现存的郑观应著作中难以寻觅到“明夷待访录”的字样的主要原因。为了与以前的“杞忧生”相区别,但又不失去为民族命运担忧的本性,郑观应与甲午之后使用“杞忧公子”这一称呼,也是符合情理的。大概是因为有“公子”二字,而当时孙中山才29岁,所以方先生误认为是孙中山。若从文章的口气看,年轻小子怎么能说“希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呢?显然,小引作者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老者。从此看,54岁的郑观应应该更为合适。

另外,郑观应有将自己喜欢的书刊刻送人的习惯,比如他曾将刘蕺山的《人谱》一书刊刻<sup>[10]1205</sup>,赠给家塾子弟。郑观应大概感觉《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甚合他的政治主张,能启迪后生,故而撰写此小册子吧。

## 五、郑观应思想与孙中山思想之关系

孙中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其所谓“吾国固有之思想者”,主要指民族主义。他说“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其所谓“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主要指民权主义。他说“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sup>[14]</sup>至于创获则颇多,不胜枚举。

从孙中山的思想渊源来讲,尽管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与其受王韬影响有关<sup>[6]35</sup>。这种说法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真正影响孙中山的,远的要属先秦儒家思想以及晚明遗民们的思想<sup>①</sup>,近的要属郑观应的思想。孙中山推崇黄宗羲,与郑观应有很大关系。郑观应大孙孙中山24岁,应为父辈之人。二人于1887年结识,郑观应对这位小老乡十分欣赏<sup>②</sup>,尤其赞赏孙中山在植物学方面的成就。他在《农功》篇中说“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唯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sup>[8]737</sup>

1894年2月,孙中山携陆皓东奔赴上海,走访郑观应。6月(五月)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介绍孙中山与其相识,并请盛将孙转荐于李鸿章。郑在信中称“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生,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sup>[8]378</sup>同时,郑观应还请盛宣怀转请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为孙中山办理游学泰西的护照。由此事件来看,郑观应对孙中

①朱谦之尝谓“孙文之‘三民’主义者:民族之说出于王船山,民权之说出于黄梨洲,民生说出于颜元斋、李刚主;孙文之‘大同’说,出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人推至天下,故‘大同’即王道,‘小康’即霸道。”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四册,1929年1月28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18页。

②《郑观应年谱长编》载:1890年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通过学年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德成西报》将考试成绩优异者刊于报端,孙中山列于其中。孙中山与本年前后在香港读书时,“偶一反乡,道经澳门”,与澳绅曹子基等有交往。这时,郑观应正隐居澳门,著述《盛世危言》,此书中有《农功》一篇,有些书中记载孙中山的话,说《农功》为其所作。本年前后二人应有交往。参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第251页。

山的关爱和帮助非同寻常,若没有很深交情,是难以作出此举的。

郑观应自商业上遭受重创以后,即便重新被起用,但李鸿章一直对之不信任。《盛世危言》中的诸多变法主张难以被朝廷采用,甲午战败之后,变法情势日亟,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孙中山上书,绝非是年轻冲动之举,而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并富有智勇的热血青年才有的创举,其中是否有郑观应的授意成分呢?这也值得深入考察。之所以如此想,是因为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实际上是浓缩的《盛世危言》本。只要我们对照二者的内容,定能对之确信不疑。此问题将另文论之,此略举一例,以证不虚。郑观应在写于1892年暮春的《盛世危言》自序中说“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sup>[8]233-234</sup>在这段话中,郑观应提出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主张。这一主张在1894年6月孙中山上李鸿章的书中有体现,只是做了进一步地拓展,变成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sup>[7]18</sup>四事。此书的主张似乎比郑观应的观点更成熟,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它是经过郑观应和王韬修改的。对于当时的孙中山的思想和郑观应比较,仍旧不够成熟。<sup>①</sup>

孙中山上书的失败,固然是其个人人生经历的一次挫折,似乎是一种偶然现象,但若放在历史长河中观察,实质上是一种必然。李鸿章未采纳孙中山的建议,使孙中山看清了清廷腐败不可救药的现实。具有雄才大略的孙中山开始还幻想通过劝农工,垦荒等革新,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可此次上书受挫后,一切美好的幻想都破灭了。面对没落的、懦弱无能的满清朝廷,孙中山看到,欲改变中国,与其寄希望于皇帝或朝廷大员,不如寄希望于民众,从而萌生了革命的动机。要革命,自然要有革命的章程,于是1894年11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宏伟设想。那么,何种思想能够与未来合众政府要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相契合,从而鼓舞天下人呢?郑观应撰写小引的《原君原臣》自

然成了孙中山等兴中会成员们宣传革命思想极合适的小册子。

杨际开认为小引作者是王韬,大概是受柯文的启发。<sup>[6]5</sup>王韬确实看过《明夷待访录》,在《答包苻洲明经》中,王韬说“盖天心变而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sup>[15]</sup>但遍读王韬著作,难以找到王韬的号与“杞忧公子”之间的蛛丝马迹,也难以找到与《原君原臣》小引较为接近的表述。固然王韬有撰写该小引的可能性,但诸多证据表明,此小引并非其所为。孙中山从郑观应那里获得启蒙后生,并由郑亲自撰写小引的《原君原臣》小册子,应符合史实。

#### 参考文献:

- [1] 黄宣民, 陈谷嘉. 中国哲学(第16辑) [C]. 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528.
- [2] 杨际开.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
- [3] [日] 小野和子. 关于孙中山赠南方熊楠《原君原臣》一书的若干问题 [C] // 黄宣民, 陈谷嘉. 中国哲学(第16辑). 长沙: 岳麓书社, 1993: 536.
- [4] 李敖. 李敖大全集(7) [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10.
- [5] 方祖猷.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启蒙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 [6] [美]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 [M]. 雷颐, 罗检秋,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7]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1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8]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9] [清]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校释 [M]. 孙卫华, 校释.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 [10]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下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11] [清] 黄遵宪. 黄遵宪集(下卷) [M]. 吴振清, 徐勇, 王家祥, 编校整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434.
- [12] [清] 王韬. 弢园文新编 [M]. 李天纲, 编校.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146-149.
- [13] 夏东元. 郑观应年谱长编(上)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373.
- [1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等. 孙中山全集(第7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60.
- [15] [清] 王韬. 弢园尺牘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93.

(责任编辑: 方英敏)

<sup>①</sup>钟卓安曾就二人思想进行过比较。他指出:与《盛世危言》五卷本相比,当时的孙中山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的认识水平,尚不及郑观应深刻:一是“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思想,还没有脱开“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不如郑观应以工翼商、以工商立国,对泰西实行“商战”的主张切合时代脉搏;二是孙中山还没有注意到中国应该朝资本主义方向实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与郑观应君主立宪的议会主张几乎相差一个层次;三是孙中山还没有形成象郑观应那样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性观念,基本上仍处于局部和感性认识居多的水平线上。当然,这与孙中山的阅历还远没有郑观应丰富不无关系。参见钟卓安《郑观应与孙中山》,《岭南文史》,1994年第2期。